

“天下”、中国与世界文学

□王 斑 叶玮玮

叶玮玮：王老师好，您的著作《世界中的中国：文化、政治和世界观》(China in the World: Culture, Politics, and World Vision, 2022)堪称是从世界看中国的扛鼎之作。在此著中，您对康有为、梁启超的“天下大同”“爱国主义”观点进行了鞭辟入里、深入浅出的评述。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康、梁的“天下大同观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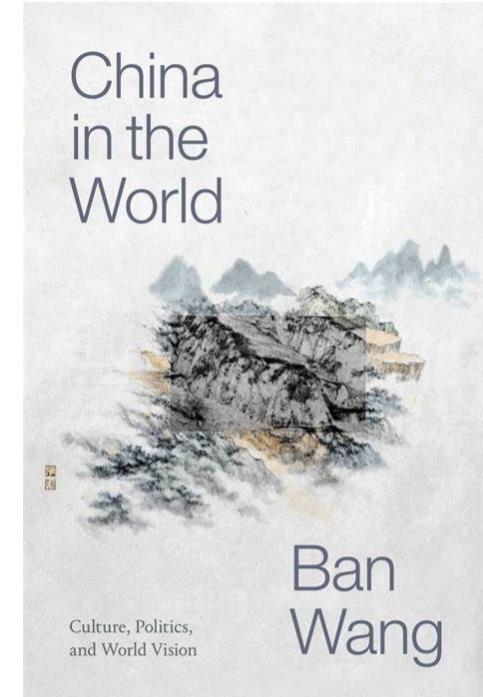
王 斑：康有为、梁启超生活在帝制转化为民族国家的时代，在政治活动和思考中，康、梁都意识到建立民族国家概念的重要性。康有为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持批评态度，视其为世界太平的祸害和根源，认为殖民列强乃“自私其国、夺人之国”，扩张权利掠取他人领土、市场、资源；倡导去国弭兵求大同。相较于康的思想，梁启超关于民族和国家的理解较为现实。

在梁启超看来，在当时的列强扩张时代，民族和国家能够很好地凝聚群体，确保同种、同宗、同俗之族群互为“同胞”，从而形成独立自治、组织民治的政府，为本国谋公益、抵御他族入侵。梁启超深谙西方民族国家的局限和弊病，在观摩巴黎和会及国际联盟时，梁就提出，世界大同为时尚早，但国联的诉求却与天下观遥相呼应，并由此提出“世界主义国家”概念：国人要爱国，但不能只认本国不了解世界。世界主义国家力图发挥其成员的天赋才能，把国家作为人类全体进化的一个手段，“不是把自己国家变得富强便罢了，而是叫自己国家有功于全人类”。

叶玮玮：康、梁“世界大同”思想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层面扮演怎样角色？

王 斑：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构想和实践，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，可以说正在将梁的“世界主义国家”理想付诸实践。

叶玮玮：2017年，我在攻读博士学位之时，曾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接受联合培养；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想过文学研究能够被放置在“环境人文”这个“从地方到全球、从生态到万物”的跨学科新术语之下。我一度认为，中国学者追求纵深，西式学者偏向广博。您在新著《世界中的中国》第八



《世界中的中国》英文版封面

章中，也呼吁西方的中国研究应从中国本土生态视域重申世界主义，进行更纵深、传统的研究。是否正是因为您意识到，单就康、梁“天下观”及“新型中国世界主义观”的理解，西方汉学界与中国本土学者就有分歧？您认为，中西学界跨界对话需注意什么问题？

王 斑：是的。西方主导论述对“天下”话语一般持否定态度；他们认为，中国的“天下观”是要重组世界格局。在西方话语界，康德“普世主义”有绝对话语权；若是中国谈世界，则容易被扣上以特殊性冒充普遍性的帽子；中国本土评论家谈“走出去”，容易被说成想重焕昔日大同。但如赵汀阳所说，当今世界甚至不足称为“一个世界”，仍有弱肉强食、丛林法则之感。

在我看来，中西学界对话时应纵深、全面地理解“本土与世界”。关于“天下”，素有中国和西方学者忽略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。我认为，20世纪中国历经改革、战争、革命，继承中国传统中可与现代价值能接轨的遗产。从民族国家和天下观融合角度来看，中国早已在“世界主义国家”的征途上。

叶玮玮：王老师，您的研究堪称“全球地方性”(Glocalization)研究的代表。您是否遇到过关于“何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学”类的基础问题？您如何看待“地方的即是全球的”这一说法？

王 斑：我会跟学生解释：生态批评是对环境污染、生态危机、气候变迁的思考；其核心论题是强调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共存，反思“人类世”(Anthropocene)，批评“人类中心论”(Anthropocentrism)。我素来对“人类世”持审慎态度；该概念忽略经济体制、生产方式对外在自然的索取，对内在自然即生产者的剥夺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，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待内在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取向。

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时三百余年，酿成了破坏自然的恶果。生态危机并非产自现代农耕，也不可归罪于低消费劳动阶级。“人类世”概念将气候危机归于人祸，笼统对所有人间责，掩盖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生态撕裂及阶级矛盾。我经常告诉学生，并不是人类整体造成了环境危机，而是某个历史时段的经济体制和资本集团肆意扩张的后果。“人类世”的说法，遮蔽了资本集团、金融权威和科技寡头生产方式的后果；它掩盖了一个事实：有钱人总有办法生存，至少可以多活几十年，甚至殖民外星球。所谓“人类的化石足迹”(human fossil footprint)更是大而无当的说法：它无视穷困族群被异化的现象；与那些开不起车、生活在窝棚、终身赤脚的人毫无关系。

叶玮玮：如此说来，曾经西方人文话题下的“世界文学”和“人类世”本质还是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语境延伸的话语，这样理解可以吗？

王 斑：没错。西方人文话题下的“世界文

学”和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是孪生兄弟。大工业的兴起，资本积累在全球的扩张，世界贸易和市场的发达，让歌德开始倡导“世界文学”。马克思也说，资本主义大工业不用本国的原料而攫取别国原料，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，也供世界各地消费。如此场域下的“世界文学”概念的提出，旨在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化为公共财产，地方文学也就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。但是，资本世界远不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包容的世界；他有劳动分工、尊卑贵贱秩序，由资本金融统治奴役边缘，把世界分裂为统治和依附体系。强势国家从弱势地位攫取资源、剥夺劳力，破坏当地社群文化；这就是“生态帝国主义”和“生态殖民主义”的议题。西方人文话题下的世界文学的想象固然美好，但这样的残酷不平的世界，如何能造就世界文学的共享平台？

叶玮玮：王老师，我明白了。您躬耕践行着中国学界常谈的“平等对话”，想让世界听到多元本土世界的声音。生态文学作为从环境公正视角审视生态与人性、民族发展与多样物种的书写，是否具有“走出去”的先天优势？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，中国本土的生态文学就是“世界文学”；或者说，所有能被冠名为“生态”的文学，本身就有世界文学性？

王 斑：是的。我们谈“文学走出去”，所期待的是与世界接轨，是中国作品在世界文坛得到公平待遇，是确保国际读者能公正评价中国历史、社会和人心。上世纪30年代，上海周作人、林语堂等人倡议“文学世界主义”，就有同样的诉求。但是，彼时的他们是在殖民租借地发出这种声音，根本没人理睬。走向世界愿望很好，但当时的现实很残酷。当时的权力结构、文化交流其实很大部分保留着殖民主义的尊卑贵贱的秩序。中国文化虽然走出了国门，但远远没有进入到与人平等交流的平台，因为掌控话语平台之人不会轻易让你成为座上宾。

当下，文学“走出去”有时会隐含着一个迷思，即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跨文化对话蔚为大观，

多元文化大门对所有人都敞开。但是，西方的“世界文学”，所依赖的是西方人文主义、启蒙传统。人文主义植根于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，注重理性、主体和自觉；在艺术上，倡导独创、想象和真情。如何与过去神权主导世界观和前现代的封建宗法秩序群决裂，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；这才是全球性思想的革命，是在世界传播的思想。人文主义近百年来的华丽转身，一跃好像成为跨文化、跨国界的思想先锋。但是，君不见西方人文主义包藏着狭隘、偏见、傲慢和霸权，欧洲中心论及放大的民族国家论，以及奴役自然、劳动者、妇女和动物的“人类中心主义”。西方的经典小说常以个人成长的履历为重心，描写个人成长、家庭关系、社会和政治层面，着重谈及个人的自我及社会、历史的关联。比如，狄更斯小说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完全嵌入早期维多利亚政治氛围内，描述那个时代的阶级和性别作用，呈现大英帝国的风土人情。如此一来，西方的“自我”远没资格称“世界公民”，而是植根于某一地缘的表象。此“个体”更像是个四海漫游的异地探险家、经纪人、贸易商人、风险投资者。他足迹遍布天涯海角，掠取当地自然和人力资源；其身后是资本财团和殖民帝国的船坚炮利，而资本全球的扩张是自由个体形象的推手和后盾。

如此，我们如果想要赋予文学以真正世界性，就必须突破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。西方经典人文主义视角就很狭隘，人类之外的天地万物，仿佛只有在人的狭隘视野中才有意义和价值；外在自然环境不过是社会环境和文明发展被压抑的背景。也正因如此，生态批评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视角深入地球万物万类，重视同呼吸、共命运的人与生物系统，触及气候、空气、植物、山川及生灵万物互联系，能够作为挖掘文学的世界性的重要工具。如此，生态文学作为建构共同体的一方空间，自然堪称是真正的世界文学。

(王斑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院教授；叶玮玮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)

拉丁区紧靠巴黎古罗马卢泰斯浴场，是继城岛“摇篮”之后出现的法兰西文明摇篮，流传着阿贝拉尔与其女弟子埃洛绮丝相爱私合，不幸被女方叔父毒死的凄惨罗曼司，显现在13世纪传奇小说《玫瑰传说》的细密画幅里，使此地数世纪以来沉浸于这种神秘浪漫的氛围中。

拉丁区包括巴黎市第五区和第六区，有索邦大学，秀丽的卢森堡公园和肃穆的奥德翁剧场，以及遍布各处的文化咖啡厅，堪称法国首都文艺气息最浓厚之地。

说到卢森堡公园的魅力，最近《费加罗妇女杂志》采访当红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·卡莱时，问及她最奢望的念想是什么，她立即回答：“生活在卢森堡公园近旁。”路易-塞巴斯提安·麦赫西耶(1740-1814)是继狄德罗之后描绘巴黎风尚的最佳作家。1790年，他推出了长达十二卷的《巴黎景象》(Le Tableau de Paris)，展示了巴黎面貌的嬗变。在他之后，巴尔扎克因生活放荡，挥霍无度，欠了一身债，不得不走上靠写小说度日的艰难途径。他笔下的“巴黎生活场景”跟狄更斯的雾都伦敦一样，将眼前的城邦当做写小说的灵感源泉，使小说情节与繁华市井风情相映衬。1833年，他发表小说《费拉古斯》，称巴黎为“十万部小说的城市”，让这座“启蒙城”从19世纪初就成为世俗小说的渊源。而小说本身也就形成“最著名的文学种类”，从拉丁区风行起来。

巴尔扎克是最早把小说写作与城邦生活挂钩的作家。依他看来，巴黎是一座远古人类供奉的摩罗神。在小说《费拉古斯》中，“巴黎生活场景”出现在年轻骑兵军官奥古斯特·德·穆兰古尔眼前。他眺望女郎克雷芒丝远去，消失在诡奇的街巷，将游人引入欧仁·苏《巴黎的秘密》，胜过大仲马《巴黎的莫支干人》。巴氏在小说《费拉古斯》里写道：“在巴黎，有一些名声败坏的街道，好像一个无耻之徒一般……”他因而把巴黎城邦拟人化，为的是更形象化，给读者真实的感觉。在另一部小说《金眼女郎》里，他呼吁出现一个新的但丁，以便能够描绘出巴黎不同的社交圈。

将巴黎变为小说的，还有维克多·雨果。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追溯中世纪的巴黎，描绘卡西莫多、爱斯梅拉达和弗赫洛的三角情爱，以悲剧告终。还有巴黎“奇迹窟”里的丐帮，勾勒出“悲惨世界”的雏形。可以说，雨果同巴尔扎克一道，挥毫构筑了以巴黎为背景的神奇小说框架。尚需提及的是左拉，他的《卢贡-马卡尔家史》概括了法国第二帝国的社会面貌。其中第三卷《巴黎肚腹》中的巴黎中央菜市场，恰似左氏“巴黎圣母院”，让巴黎成了一座奥斯曼男爵心目中的巴比伦。更多的作家和诗人参与营造巴黎的文学天堂，诸如浪漫诗人缪塞，《雅克万特拉》三部曲《吉提》《高中毕业生》和《起义者》的作者茹尔·瓦莱斯，和归属于自然主义流派的于斯曼，以及阿拉贡、普鲁斯特、普莱维尔、海明威、西默农等人。他们都踏着维雍自“百年战争”的巴黎足迹，为这座城市留下笔墨手迹，均带有一种浓重巴黎腔或者巴黎变象。

事实上，巴黎城邦丰富小说家们的想象，滋养了他们的创作，其身影也就倒映在他们撰写的小说里。雨果曾有言：“人性喜游荡，而巴黎善闲逛。”大画家多米埃则刻画出习惯游逛的巴黎人的真象，怀着“巴黎抑郁”的诗人波德莱尔在他的画家朋友康斯坦丁·居伊身上找到了典型。居伊总在漫步街巷中寻觅创作的灵感火星。此君远非卢梭那样追求深化内心哲理，而是漫无目的地东荡西逛，好奇地面对路途上的景物和行者，随之冥思浮想，感受生活习惯的节奏，孕育一种自然美学。始于18世纪的“漫游文学”正与漫游者的城邦见证有机联系在一起，恰似一类“全景文学”。作者环视四周全景，起始仅仅出于好奇心，逐渐产生审视目光，转而写起小说来。

无疑，这是从巴尔扎克、雨果到左拉和于斯曼从事小说创作，筑起文学伊甸园的一段心路历程。此一视角，也正是今人来巴黎漫游追溯昔日“文学天堂”的线索凭依。如此这般，真正的作家远离经济生活的苛求，更不图文学创作的经济收益。只要读魏尔和于斯曼的《巴黎素描》就不难看出，这本是“诗意图”的传统，直至20世纪上半叶，还没有敲响丧钟。列昂·保尔·法赫格1939年发表《巴黎步行人》，忠实地回忆，追记他

天涯异草

巴黎拉丁区，往昔文脉的失落

□沈大力



多米埃笔下的巴黎人

生长之地巴黎的畴昔失去辉光，表现了早期的“境遇主义”(le situationnisme)。苏波尔特在《巴黎最后的夜晚》，阿拉贡在《巴黎农民》里也表露了“巴黎夜梦”的神话。

我有幸步他们漫游后尘，目睹巴黎文学天堂的余晖。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我到巴黎先游拉丁区，几度从巴黎大学广场踱步到对面的卢森堡公园休憩。卢森堡公园被称为拉丁区的“绿洲”，雨果选择这里作为他长河社会小说《悲惨世界》主人公冉·阿让终了的境遇。

我端坐在卢森堡公园后回廊一座石雕像前，静思《悲惨世界》里的情节。此时，老迈的冉·阿让更名勒布朗，把珂赛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，领她在公园僻径散步，偶遇青年玛里乌斯。园内一片寂寥，鸟儿在野栗树荫中啁啾，一片良辰美景。白发老翁跟年轻姑娘缓缓前行。

雨果描写道：玛里乌斯似乎觉得，长达几个世纪的光阴突然变成一秒钟的时刻。他听见来者轻轻的脚步声，低下头来。再抬头时，二人已经走到近前。年轻姑娘正凝神瞧他，那沉思的温柔目光令他浑身战栗。姑娘好像一腔怨尤，责备他这么久都没有来找自己，而且直说：“是我来了。”对着这双深邃无底的晶莹明眸，玛里乌斯不禁目眩。那是一颗尚不熟悉的灵魂透出的眼神，仿佛拂晓的晴空。玛里乌斯目不转睛，直到对方形影消失。

小说《悲惨世界》里，玛里乌斯与珂赛特这对年轻情侣是在拉丁区卢森堡公园邂逅的。书中另一女子爱波丽特是巴黎顽童加弗罗姐的姐姐，一直暗恋着这位青年。她手上一封受珂赛特委托的信，要交给她。当时巴黎民众正悼念遭杀害的拉马克将军发动起义，在尚沃尔里筑起街垒。玛里乌斯守在街垒上，发誓与起义者共生死。爱波丽特急急赶来送信，在危急时刻挺身挡住了朝玛里乌斯射过来的子弹。瞑目之前，她将珂赛特的信交给玛里乌斯，恳求对方吻自己一下，凄惨死去。这可以说是《悲惨世界》里最感人泣下的场景。总之，若说珂赛特的生母、柔弱的小女工芳汀是被拉丁区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学生始乱终弃，珂赛特最后还是跟慈父般的冉·阿让回到拉丁区她这个人生的归宿。其情其景，仿佛昨日一般，自然闪现在今天来到拉丁区的异邦陌生人眼前，使人将小说中的关键人物与巴黎拉丁区的境界连接起来，在眼下的景致前边，浮想联翩。可见，漫步拉丁区时，我深感这里文学意趣浓厚，与伦敦、纽约的

繁华市容迥异，难怪人称其为“文学共和国”。从巴尔扎克和雨果或左拉时代以降，经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此地虽几经变迁，但其文学风貌始终如一。首先，区内各街巷遍布各类书店：在奥德翁剧场周围，我在“拉辛书店”到“弗拉马利翁书店”，特别是多家经营古旧书籍的小店里，兴致勃勃地翻看一堆堆藏书，时不时能碰到一些平日很难找到的作品老版本。那天在卡赛特街口，我进入一个很不起眼的、看上去相当混乱、由几个旧书摊组成的书铺。举目横扫几层木板书架，突然发现19世纪诗人奥古斯特·巴尔比耶(1805-1882)讽刺1830年革命果实篡夺者的诗集《抑扬格》(Imambes)和1848年革命诗人莫罗的一部《诗集》。取下这两本诗集，我向店主询问书价。他看我是一个不远万里来到巴黎的中国人，对一般年轻读者鲜为知晓的法国19世纪的诗人如此有兴趣，欣然将书免费相赠，意在交个异国朋友。须知，这类可能已成孤本的珍贵古籍，真要拍卖起来肯定价格不菲。我初次涉足六角国，就受到启迪。谁云资本支配下书商都重利？此乃虚言。更远一些，圣雅克街上的《彼岸》也经营旧书，一些难得的历史、文化和文学典籍，对收藏家尤为可贵。但店主却无意居奇，仍按平价

出售。“儒勒·凡尔纳科幻小说专营书店”亦然，包括多种异常精美的绝版书。沿着通向塞纳河堤岸的圣米歇尔大街走一趟，那边吉贝尔·约瑟夫书店等数家大文化企业是楼层建筑，十分显眼。购书者摩肩接踵，川流不息。在这儿，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文学作品应有尽有。我买到了几乎所有来法国前欲采购的书籍，果不虚此行。

从圣米歇尔喷泉向右转，到木柴坊街37号的“莎士比亚书店”，见其店抄录该书店创始人乔治·惠特曼的英文语录：“巴黎当地报纸称吾‘拉丁区的堂·吉诃德’，因为吾脑海淳想径入云端，众人仿佛都变成了天堂里的安琪尔。”这家“莎士比亚书店”被誉为最具乌托邦色彩的文斋，不乏其趣。乔治·惠特曼强调其意向：“吾志在开办书店，因为书籍营销是蓬蓬勃勃的生意。然生意系富有生命力的现象，即盎然生机，绝非纯粹‘做生意赚钱’。”莎士比亚书店对面的塞纳河堤岸是巴黎传统文化奇景。这里是在岸长达数公里的绿木箱旧书摊，千余“绿箱”里蕴藏着30余万册古旧书籍，堪称一处巴黎淘书宝地。右岸城岛上的巴黎圣母院让游人想到雨果的同名小说，似乎恍见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的倩影，以及她跟钟楼怪人卡西莫多、“太阳神”腓比斯和黑衣教士弗赫洛的瓜葛。附近开着“埃斯梅拉达旅馆”，一切透露着雨果文学传至天涯的浪漫遗迹，为拉丁区文化点缀，引动路过行人的怀旧感，驰想到巴黎景象乃是整个法国文学结构的核心。

然而，四十载春秋逝去。我于21世纪初重返巴黎拉丁区，情景已今非昔比。正如浪迹巴黎的诗人波德莱尔预感到的，街，另一家“罗贝尔·拉丰出版社”已经从圣苏尔比斯广场迁走，“弗拉马利翁书店”总部也离开了奥德翁广场。巴黎几家大出版社相继离开拉丁区，让位给时髦服装店和盈利丰厚的鞋铺。过去，有萨特和西蒙娜·波伏瓦等文化名人光顾的圣日耳曼大道“花神咖啡厅”，不少作家带着准备付梓出版的手稿，到“两瓷偶”咖啡店商谈。圣日耳曼林荫道成了文学活动的标志。法国作家夏布洛尔曾经约我在花神咖啡厅见面，互通款曲。



塞纳河堤岸的旧书商“绿箱”

街

而现在，这个街区在文学上却几近荒芜，再不见一拨拨“粉丝”崇拜文坛秀出群芳的名流在彼蜂涌蝶舞。出版家奥利维埃·贝杜赫奈确认：“四十五年中，我亲见这个区慢慢‘风化’，逐渐失去了往日实实在在的社交脉络，文学杂志尚存，对此地的活力非常重要。”“花神咖啡厅”、“王桥”、“圣日耳曼驿站”和“地中海”等处，旧貌没换新颜，颓疏文采，来客日益稀少，都到别处去消磨度日。确实，现今的消费者如乌埃尔贝克，或让·埃什诺兹等作家们想出头，已经不再需要像过去那种社交活动了。

显然，在经济离心力的支配下，“文学巴黎”已在拉丁区消逝，成了十足的弥尔顿“失乐园”。从圣米歇尔和圣日耳曼两条大林荫道放眼望去，昔日古香古色的书店群落已被琳琅满目、霓虹灯闪烁的时髦商店取代。拥有荷兰血统的巴黎通作家于斯曼的话说，“在此犹如到了大洋彼岸的谷物和牲畜集散中心，阴沉的美国城市芝加哥”。加速实现的“美国化”，让欧罗巴传统的拉丁区失去六角国的文化特性，特别是浪漫主义的诗魂，令法兰西儿女感怀伤感，哀叹今朝巴黎失却了宝贵的、令他们引以为豪的“文学天堂”。